

# 从公共食堂到文化礼堂： 杭州乡村公共空间变迁与现代化进程

习少颖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作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杭州农村文化礼堂, 其前身在最近 70 年间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的演变: 20 世纪 50—70 年代,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公共食堂代表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置换, 其空间含义多在政治层面; 20 世纪 80—90 年代, 随着基层治理权放置乡村, 新的经济形态更叠, 曾经的公共食堂被用于厂房和电影院, 空间含义偏重于经济层面; 进入 21 世纪, 完成资本积累的浙江乡村开始探求精神归属, 文化礼堂在杭州首创, 最后成为遍及全国的乡村公共空间样板。杭州农村文化礼堂的演变简史, 为我们展现了空间作为一种媒介与人的互动和社会关系的形塑, 以及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外部力量与村民自主力量在空间媒介作用下的协同。这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乡村公共空间提供了更多可能。

**关键词:** 公共空间; 公共食堂; 电影院; 文化礼堂;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5-0057-09

## 一、引言

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始于城市建筑及规划领域对城市公共交往空间的关注与研究。它意味着向所有人开放, 被所有人知晓并承认, 具有公共性、市民性和集体理性。从希腊以来的公共空间发展历史看, 公共空间具有政治实践及社会交往的特性, 历来都是权力展示与争夺的空间。在缺乏相对集中的公共活动场所的中国乡村, 祠堂、礼堂、教堂、小卖部、茶馆、村落中较大的空地, 都可以成为公共空间, 并由此成为培育意见领袖和形成舆论等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媒介的一种。<sup>[1]</sup> 曹海林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sup>[2]</sup> 董磊明将村庄公共空间的基本内涵分成有形的场所、权威与规范(包括内生与外生两方面)、公共活动与事件、公共资源等四个方面。这些概念呈现了乡村公共空间的三个构成要素: 实体空间、实践活动、关系结构。这也是人文地理学的观点, 即人们通过使用空间, 赋予不同的生活体验, 从而将“空间”(spaces)转变为有归属感的“场所”(places)。乡村公共空间对于乡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实体特征在乡村空间形态中的作用, 还在于它使人们在空间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特定的感知和记忆。正是这些记忆的集合形成了空间的整体意象, 使人能与空间产生超越物质环境的深层次联系, 并进一步成为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承载物。<sup>[3]</sup>

爱德华·索亚认为, “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 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sup>[4]</sup> 1949 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公共空间一直并存着多种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国家权力抵达乡村最底层。从 1978 年起, 随着商品经济进程开启和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乡村公共空间同时呈现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等多层关系交织, 并随

国家发展重心和自身需求的调整,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于不同层面。其中,在 2013 年浙江省首推农村文化礼堂以来,这种新型乡村公共空间形态在全国迅速推广,从而使乡村公共空间建设成为一个显性问题。国内已有的乡村公共空间研究,偏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乡村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公共属性和政治、社会意义的空间形态。起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村传播和发展传播学也对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有所探究。赵旭东在批评其中一种倾向时提出,研究者都“带着强有力的外来者的观念和想象,从而把他们所关怀的乡村界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地方……也许最根本的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sup>[5]</sup> 本文将农村文化礼堂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代表,通过回溯梳理 1949—2013 年间《杭州日报》相关新闻,发现杭州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50—70 年代,国家以人民公社作为组织形式,公共食堂作为主要的空间载体,完成了对农民的意识形态“再造”;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基层治理权放置乡村,新的经济形态更叠,厂房和电影院代替公共食堂成为乡村公共空间,其空间形态偏重经济属性;2000—2013 年间,城市化进程加快,杭州农村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兴盛和政治自治,文化礼堂成为探求新的乡村公共空间的具身行动,空间内容更为杂糅多元。如果说早期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是通过国家控制主要的社会资源并加以政治化来实现的,那么后期我们看到更多的力量包括作为主人的村民主体性的回归,借助经济、文化乃至心理资源,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协同再造。由此本文认为,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空间媒介,一方面以空间实体传播信息,另一方面形塑了空间中实践的群体对国家、地方和现代化的认识,并推动了相关行动。本文同时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通过公共空间产生与乡村现代化的关联,并在空间实践中完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同时探讨建构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可能。

## 二、作为政治空间的公共食堂（20 世纪 50—70 年代）

正如安德森等人所言,“我们并不通过个案研究去揭示全世界,而是经由这一个案唤起某个特定的世界”。<sup>[6]</sup> 1949 年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虽然这一变化早于 1900 年就已经开始。一些长期以来支撑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顶梁柱开始变化。<sup>[7]</sup> 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开始被改变。中央政府强化了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以及农村新的政治意识和文化形态推动了解放初期的阶级划分和土地改革,动员、组织农民从合作社转向高级合作社再快速合并到人民公社建设。这一变革迅速改变了中国乡村延续百年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及文化形态。高度组织化与纪律性的农村基层、反复的政治活动和宣传,最终形成了对乡村文化的统一。<sup>[8]</sup> 资料显示,浙江省在推进土地改革、划乡建乡等工作的同时,在文化上推动了学科学、学文化的热潮。农村普遍办起了黑板报、文化室、读报组。农民自己组织剧团 8000 多个,参加人数达 16.86 万人,农村文娱活动十分活跃。<sup>[9]</sup> 但在人民公社推行后,这些活跃的组织或团体基本停止了活动。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队为基础的三级组织完全取代了一切的行政和非行政组织,除此以外,“不再有任何民间的生产、生活、娱乐组织”。<sup>[10]</sup> 虽然国家在政治层面实现了中国乡村的一体化,但为此后近 30 年乡村文化的停滞埋下伏笔,也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和现代化路径画下浓重的底色。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分析中国华北乡村的治理结构时发现,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从而构织起了权力的文化网络。<sup>[11]</sup> 借用此理论,本文认为,最能代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征的公共食堂,作为一种乡村公共空间和一维性政治空间,以一系列的象征和规范成为国家权力在乡村形塑意识形态的空间媒介,亦成为新中国推进乡村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方式。新旧中国由此分割,传统丰富多元的乡村公共空间得到根本性改造,乡村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对新建国家的政治认同,迅速完成了乡村的政治现代化过程。

在1949年之前的传统村落里，家庭、宗族是形成凝聚力的主要来源，宗教、村社组织等是主要的社会形态。国家对通过科举制度、土地买卖、经商等多种途径的社会流动持开放态度，这也使村里的社会等级变化不定，佃农与地主往往出自同一个家族，这一切淡化了社会的阶级认同。1949年之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都迅速实现了社会整合，其中在社会结构上推行以公共食堂为代表的人民公社制度。公共食堂的起源是农忙时节村民之间在劳动上的互助合作，目的是提高劳动效率。但在1958年8月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公共食堂成为体现政治制度优越性和主要特征的代表性空间。毛泽东同志多次称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至1959年底，中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sup>[12]</sup>其中浙江省至1958年10月共有公共食堂8.69万个，多数是常年食堂，参加食堂人口占到70%—90%。<sup>[9](217)</sup>

如果说日常开会代表了某种剧场社会的“做秀”，<sup>[13]</sup>吃饭却是实实在在谁都不会马虎的真实意愿表达。能够从原来的贫困中解脱，成为拥有土地、吃饱饭的人，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生活目标。浙江省五洞闸人民公社村民杜庆裕在1959年说到土改分到七亩六分地还有两间瓦房时，认为“全家人都亲身体会到，毛主席真正是为了劳动人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组织起来，是穷到富的必经之路”。<sup>[14]</sup>而以提前抵达的共产主义模式推行的公共食堂，经过大力宣传，在农民的意识中，已经不仅是理想生活的代表，还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先进的象征，无论他们是否真正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1959年杭州笕桥人民公社女社员陈阿凤说到公社化后建设起来的大礼堂兼食堂时充满自豪：早上“起身后食堂里一走，饭也领来啦，洗脸热水也拿来啦；吃完早饭碗筷一撂就好上地去”。<sup>[15]</sup>在浙江省五洞闸人民公社，“土广播刚响过，人们从四面八方食堂走去。十四食堂的炊事员，昨天乘着月亮捉来很多鲜鱼，杀了一口大肥猪。今天，大盘大碗的红烧肉、煎白鲢鱼、烧芋艿、油豆腐等摆满了一桌”。<sup>[14](111)</sup>到了晚间，食堂又变成文艺活动的礼堂，“双簧剧‘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嘴脸’引起了全场的大笑。‘人民公社好’的说唱相声和小喜剧‘三摆渡’都演得很好”。这些表演的最终目的是“加油干，明天生产要搞得更好”。有顺口溜描述公共食堂，“……铁匠吃了食堂饭，三间草棚能炼钢；工匠吃了食堂饭，能叫石蛙长翅膀；干部吃了食堂饭，心中升起红太阳；工人吃了食堂饭，发明创造赛葛亮；军人吃了食堂饭，狠狠打击美国狼……”。<sup>[16]</sup>此时，从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理念观察，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意识以一日三餐的生活形式，通过农民每日走进公共食堂的行为，潜入他们的思想中。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第二层次是空间的表征，即空间以符号化的形式表达观念与文化。在公共食堂这个空间中，与“走进”这个日常实践直接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符号化的行为规范。包括他与全家人参与公社劳动获得的粮食，统一由上级先分配到食堂，再由食堂分发给个人，农民自身基本不保留私有财产。这一行为规范作为代表大家共同劳动并分享劳动成果的共产主义社会符号，映衬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农民吃饭与作息的时间，与公社播放各项政策与会议消息的有线广播运作统一步调，强化了公共食堂的媒介属性，并在此空间中实现了政治现代化的实践与表征的统一。资料显示，浙北农村从1958年开始推广有线广播，到60年代中期，有线广播已经普及，不仅村落里的每家每户都已装上有线广播，而且田漾里也装上了大喇叭。浙江钱塘江公社于1958年建设的广播站每天播音三次，播出的内容包括新闻、革命歌曲、农业科技、气象预报以及各种切时的宣传资料。大部分农民从来不关闭广播，因为广播的节奏恰巧与农民的生活节律相一致。据称那时候，只要走进村落，可以不断地从广播中听到革命的语言。<sup>[17]</sup>

1961年5月，因普遍的浪费、农业欠收、干部腐败、权力滥用等问题，中共中央叫停了公共食堂。但很快阶级斗争在这个空间登场，一维化的政治空间以另一种方式接续呈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的斗争”。自此，浙北农村干部们在谈论农村的各种不良倾向时，开始将之归结为阶级斗争，从而使农村的社会生活不断地趋于政治化。<sup>[17](107)</sup>从空间生产理论理解，群体在空间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意识的再生产。人群聚集的开会、批判或庆祝等行为，成为输入、接纳新的政治术语和形成新的政治意识的重要空间实践，过去虽有贫富分化但关系亲近的宗族亲友，在频繁的“阶级控诉”行为中，成为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据《杭州日报》记载，1970年除夕前一晚，杭州杨家牌楼大队的礼堂里口号震天，正举行着忆苦大会。对本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进行了一次批斗，并请在新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倒倒苦水，来一次忆苦思甜，目的在于教育民兵过节不松战备这根“弦”。<sup>[18]</sup>新闻还记载了1974年8月22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视察萧山东方红公社十五周年纪念日”上，千余名社员代表汇集在该公社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sup>[19]</sup>曾经的公共食堂成为新国家政权切断传统村落家族文化联系的重要空间。传统的乡村文化，包括礼仪风俗、节日庆典、民间信仰等在这一时期因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受到毁灭性打击，并在“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达到高潮。

开会是一种空间的表征方式。在通信落后、传播媒介缺乏的时代，会议作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是营造特殊意识形态环境的基本手段。<sup>[17](95)</sup>在公共食堂和礼堂中召开的会议也成为组织农民认同国家与集体及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由于缺乏法治传统，意识形态成为最抽象的政策，阶级斗争和政治学习是乡村常见的政治运动，那些不服从组织和村干部行为的社员容易被视为阶级敌人加以批判。<sup>[20]</sup>研究者认为，恰是在群体中的社会革命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中国乡村这样一个注重面子的地方，被公开批判或示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当个体或家族被拉到礼堂等公开场合进行深刻批判或表扬时，人们不仅接受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教育，还树立了革命的精神、理想、秩序，从而构成了新的文化。而要坚持或强化这种文化，就需要更多的斗争和会议。

政治现代化的大幕拉开，多元混合的乡村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均质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时段，无论是传统乡村精英还是普通农民的自主性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压力下都深藏于底层。

### 三、作为经济空间的厂房和电影院（20世纪80—90年代）

当生活常规、政权体制、经济结构与符号系统发生变化，既有的空间“常态”也往往会遭受质疑，进而引起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与社会实践的相应变动。<sup>[21]</sup>因此，旧秩序的崩溃必须要寻求新的社会和空间组织方式。<sup>[22]</sup>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分层，杭州乡村公共空间形态也随之发生变更，这包括外部权威与规范减弱、内部自主性增强，公共资源从相对匮乏到逐步充盈，基于乡村自发的公共活动增多，对公共空间使用内容的变化，形塑了新的经济意识，也推进了区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并与新中国成立30年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民族整合的目标相一致。这一阶段最显著的公共空间特征是与社会的经济形态变化相一致的人际交往形式的改变，提高家庭收入成为重要的日常活动指向。浙江农村是中国东部最早进行经济创新的乡村区域，乡村公共空间在该时段偏重经济属性，也成为浙江省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最显著特征。

1982年1月中国农村正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确认人民公社体制退出。新宪法确立在农村居住地设立村民委员会，其性质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浙江全省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全部改变，成立乡（镇）人民政府3254个，村民委员会43235个，2747个人民公社改为经济组织。曾经作为批判“阶级敌人”和忆苦思甜会场的公共食堂和礼堂在闲置一段时间后，添置了座椅、灯光、银幕或机器，在空间形态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身为探索市场经济的流行形态——电影院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厂房。乡村公共空间接受了市场与乡村的结合，达成了某种默契，亦成为通过日常生活传播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与经济意识的重要空间载体。更重要的是，作为表征的空间，看电影或办工厂这些行为本身成为接受新的社会变迁的潜移默化的空间实践行动。浙江乡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

村民及村委会的自主性开始苏醒，成为这一时期推动乡村经济现代化的内生力量。据《杭州日报》新闻报道，20世纪80年代，桐庐县横村公社横村大队办石棉纤维厂需要厂房，就腾出大队礼堂当厂房<sup>[23]</sup>；一些曾用于文化表演的礼堂，因为村里难得开村民大会，也没那么多的电影可放、节目可演，也“转轨变型”，出租作厂房。临安、桐庐、萧山三县改造了现有的礼堂、会场，发展为农村影剧院。<sup>[24]</sup>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中有很多机构在礼堂放电影，举行文艺演出和联欢会，甚至将礼堂改为招待所，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村”。期间还发生过因为在礼堂看电影的农民乱扔烟蒂引发火灾，烧毁了放置在礼堂的2.8万斤粮食的重大事故。<sup>[25]</sup>在村委会之外，村民个人作为投资者进入乡村礼堂发展电影院成为新景观。如余杭县闲林镇农村电影放映员童咬虎、富阳县上官乡盛祥华，都成为媒体报道的典型。<sup>[26]</sup>不过随着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如电视、DVD的普及，电影放映队变得萧条。到2000年，杭州仅存一支农村专业电影放映队。乡村电影院和村办企业厂房的空间形态探索，显示了新时期村民在日常闲聊之外主动以商品交易和经济合作方式进入乡村公共空间，在“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双重语境下，接纳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型构了新的人际关系。列斐伏尔在比较了中国和苏联的农业生产模式后认为，中国农村分散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是一种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建设过程，其特点不仅在于促进了经济增长，还在空间中培育了社会关系的丰富性。<sup>[27]</sup>20世纪80—90年代浙江农村公共空间多元性的回归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土地分户承包后，村级合作社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村级集体经济出现了明显下滑。1986年，浙江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年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少于1000元人民币，有10%的村领导班子瘫痪。<sup>[9](330)</sup>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权力相对收缩，村庄作为基层自治单位，仍继续扮演公共服务供给机构的角色，但却没有资金供给。1987年7月至1992年7月间，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先后发出《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通知》《关于稳定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切实加强村经济合作社建设的通知》《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以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带来村级合作组织经济收入由1990年的167623万元人民币增加到1993年的514172万元人民币，增长206.74%。<sup>[9](331)</sup>乡村集体经济的充实，推动了乡村公共空间作为经济媒介和文化媒介的双重发展。“送文化下乡”成为20世纪90年代政府部门重点推动的领域。从相关报道看，有大量内容都提到地方文化馆及社会文艺人士在礼堂进行文艺演出的事件，内容为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宣传禁赌和计划生育的小戏等。新闻特别提到了在1992年春节这个特殊时期，淳安县委宣传部推动60多个农村电影队、10多个业余剧团进入乡村，许多沉寂多时的礼堂天天鼓乐不断、歌声连天。<sup>[28]</sup>虽然同样包含了政治教化的“扫黄”、歌颂改革成就的主题，但村民认为以往“全家围着火炉打扑克搓麻将”的单调生活得到了调剂。与此同时，浙江乡村传统文化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复苏。曾在“文革”期间被“破四旧”的传统乡村宗教和文化仪式在乡村慢慢重现。新闻在报道浙江一些乡村礼堂被占用作为宗教场所时用到了一个“还”字，即对占用原村礼堂、老人活动室等公共场所改建的寺观教堂、小庙小庵撤除塑像，房屋、建筑“归还村委会”，<sup>[29]</sup>侧面显示了民间文化回到前台的势头。研究者张乐天认为，民间信仰首先是一套深植于村民心灵中、复杂又模糊的观念体系。解放以后的“破除迷信”运动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如神庙被废除、供奉的菩萨被砸烂，但这些“场面上的”迷信被压制在了“场面下”，仍存在于心灵中。它们或迟或早会表现为“场面上”的东西，关键是时机。<sup>[17](85)</sup>这印证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所”，即记忆总是被锚定在特定的空间之中，通过特定形式的纪念物来表达与再现，譬如纪念碑、历史遗迹与记忆标识。<sup>[30]</sup>

这一时期，现代媒介将国家管理力量重新嵌入乡村。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乡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将村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主推动乡村公共空间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转型，并与国家力量协同，成为推动乡村经济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这与20世纪60—70年代被动、单一的政治空间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并非所有外来媒介都能实现嵌入性融合，它的前提是应符合乡

村社会需求,符合乡村社会实际。<sup>[31]</sup> 回到本研究的角度,杭州乡村公共空间从政治向经济属性侧重,不仅是对外部社会变迁的被动回应,还显示了物理空间形态对乡村公共性产生的影响,包括村民的经济理性、政治意识和文化自觉。进入 21 世纪 00 年代的乡村公共空间,开始出现了更复杂的关系交错和权力争夺,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与本土化、乡土性产生矛盾冲突,国家权力在退出一段时间后发现乡村问题丛生,重返乡村又成为主流。

#### 四、作为文化空间的乡村文化礼堂(21 世纪 00—10 年代)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即传播只有和地方共同体发生真实的关系,才能真正被受众接受,传播就是凝聚地方共同体经验的精神建构和文化再造。<sup>[32]</sup> 这与城市规划领域强调的良好的公共空间设计应突出空间的联系性、紧凑宜人的空间尺度和开放互通的建筑与空间关系的理念一致。威廉·怀特通过摄影的比较分析,发现一些鼓励人们交往的空间实体特征,如良好的地理位置、与周边街道的结合、好的步行条件和停留的空间环境等。<sup>[33]</sup> 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论,从另一个层面都指向好的公共空间应是多元杂糅、元素丰富的。杭州乡村公共空间经历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维政治空间的公共食堂、礼堂,20 世纪 80—90 年代经济与文化二维交织的电影院和厂房后,最后抵达了 21 世纪 00—10 年代多元杂糅、内涵丰富的文化礼堂。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当代村民对文化的需求超越了政治、经济需求,成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主导性因素,但多种需求又在同一空间并置展开,形成多元对话与交融,成就乡村公共空间新的形态与内涵。

这一变化以 2001 年中央实施农村“六小工程”为起点,开始从资金、技术、服务、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农产品市场链等诸方面“武装农民进市场”。当时中国乡村在经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明显的衰落迹象,表现为乡村劳动力的流出、村庄公共财力的衰退及潜在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私有化,包括来自资本对村庄资源的占用和城市化扩张带来的吞并村庄的可能。<sup>[34]</sup> 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浙江乡村在联产承包和村集体经济上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村庄形态相对稳定,农民人均收入位居全国前列。在此情况下,满足农民迫切的文化需求与实现村庄治理现代化,成为浙江农村的自发行动。

意大利语言学家恩伯托·艾柯在他的《功能与符号——建筑的符号学》中认为,建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直接面向广大群众,并满足人们的要求,它固定了某种广泛赞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sup>[35]</sup>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杭州日报》出现了很多在乡村礼堂进行村民选举、普法等内容的新闻,显示出乡村公共空间在政治文化上现代性的一面。例如,1998 年 3 月,富阳推行一种比财务上墙更进一步的民主管理形式——“村务墙”。三山镇春安村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每月把财务账目贴到村大礼堂墙上,以便村民观看。<sup>[36]</sup> 西湖区留下镇东岳村村民还在礼堂举行“海选”村官活动,在村里作调研的杭州市民政局李秋清局长认为这事在本市市郊乡镇尚属首例,对推进全市农村村民自治意义重大。<sup>[37]</sup> 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自主意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非常少见。礼堂还变成普法宣传的地方,新塘边镇曾在礼堂召开了一场公开逮捕大会,向村民宣传知法守法的重要性。无论是村务上墙还是普法宣传,都显示村民在经历公共食堂的空间政治规范洗礼后,对乡村自治的内生意愿。孙信茹等认为,村民参与媒介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增强边缘性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进而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发掘当地人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发掘在国家统一发布声音体系之下的其他传播模式。<sup>[38]</sup>

未完成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仍在延续。礼堂仍然是村民聚会与发展经济的重要场所,但包含的内容已发生变化。中国城镇化率的加速,推进了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的交融与对冲,表现为城市区域面积的扩大,城市居民对安静、美丽的乡村生活的向往,以及乡村对城市生活模式的挪移。而这两者在过去 30 年间基本是城市向乡村的单向流动。《杭州日报》的新闻显示,



乡村经济中的农家乐成为城市想象理想乡村生活的符号。杭州临岐镇和屏门乡的大礼堂平时是村民开会、演出之地，现在变成了农家乐的超大临时餐厅；王山顶自然村宽敞的大礼堂足足有几百平方米，老人们在其中娱乐、打牌。<sup>[39]</sup>与此同时，村级集体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接纳了外部企业合作，既解决了脱贫和共同富裕的政治任务，又创新性地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中乡村空间资源的资本化问题。报道显示，杭州桐庐制笔业党支部服务站和企业结对共建，让农村弱势群体足不出户就能赚钱；三合马源村闲置的大礼堂，变成了党支部服务站套笔装配点。萧山区浦阳镇桃北新村走得更远，2010年11月10日，该村与浙江云都控股集团合作组建杭州桃北实业集团，签订《村企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新农村”模式，进行农房改造、土地流转、资源合理开发等共建新农村的尝试。<sup>[40]</sup>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复苏的乡村传统文化与21世纪00年代政府主推的“送文化下乡”一起，开启了政府与乡村协同推进的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送文化下乡”的初衷是解决文化资源在城乡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短期是为农村提供更丰富的文化生活。代表性的实践包括从2007年开始，由杭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新局主办，各区、县（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杭州大篷车演艺有限公司承办的“乡风文化千里行”活动，由政府埋单、采购，直接送文艺节目到农村。一个半月演出30多场，观众4万余人次，村干部形容“村村尽盼‘大篷车’”。<sup>[41]</sup>“送文化下乡”早期出现了经费不足、村落较为分散、节目内容不足、演出频率较低等问题，推动了乡村自发进行文化空间建设。第一种形式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肇始地的临安太湖镇光辉村的成体系建设。2006年，村企业家李小芳五兄妹出资捐建了农民剧院，带动全村企业老板“工业反哺社会、经济反哺文化”。全村共130余农户户捐了款，全部家庭参与了义务投工。2011年，光辉村又以“荷塘新曲人文光辉”为主题，建设了烈士陵园、荷花广场、农耕文化陈列室等一批具有该村文化特色的项目，以及励志廊、企业廊、文化廊、书画廊和村训廊。<sup>[42]</sup>这一形式随后成为浙江全省推广的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指南。第二种形式是修建村落专门的文化展演场所，形成新的乡村公共空间。如富阳最南部的湖源乡窠口村，村民投资60多万元建起“乡村大舞台”，自己表演原汁原味的民俗节目，以代替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小礼堂。“乡村大舞台”坐落在窠口文化广场上，正对着始建于1795年的徽派古建筑“友于堂”，堂内有村民捐赠了130多件展品的江南农具文化博物馆和纪念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陈列馆。<sup>[43]</sup>第三种形式是挖掘本地特殊的传统文化资源，形成固定的民间节日，从而带动乡村文化发展。临安锦城街道横街村是钱王爱妃戴氏娘娘的娘家，该村整理挖掘了“辩辩龙”文化资料，投资2600万元建设文化礼堂，在村口建造牌坊并修砌文化墙等，集中陈列、展示“钱王文化”。<sup>[44]</sup>

列斐伏尔在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中认为，城市的权利就是居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是一种居民能够参与使用和制造城市空间的可能性。<sup>[27]</sup>与此对应，中国乡村居民的空间权利，就是他们对空间使用的自主权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推进乡村政治认同与文化现代化，农村文化礼堂的出现或重现成为重要介质。这一行动填补和调整了“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大拆大建、生搬城市空间规划、忽视本土文化保存等缺陷。在后来的“送文化下乡”中，杭州市相关部门调整了送的方式与内容，出现了“点菜单”式送文化，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风雅颂”民间舞蹈展演等活动，引导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交汇融合的文化现代化进程。2014年以后，在政府鼓励和资金投入下，大量原生态的村落庙会、社火、戏曲等民俗活动开始涌现，并以杭州农村文化礼堂为核心，推动乡村公共空间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多元空间。

## 五、结 语

回溯杭州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国家强制权力介入的20世纪50—70年代，带来了农民在政治意识上的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进入乡村，推动了乡村经济现代化；进入21世纪00年代，国家与乡村自身同时意识到了文化现代化对乡村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开始推动乡村新

型公共空间的建设。在传统乡村文化空间长达 30 年的压抑和破坏中,中国乡村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即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诸多压力下,中国乡村文化和农民精神向何处去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2010 年以来,我们不仅能看到明确的资本介入、城市型公共服务的增设,还有推进乡村治理的法制化、自治化行动,这是当代浙江农村公共空间发展的可喜景象,亦是在过往 70 年间,空间作为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协同现代化过程。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运动和改革开放历程,其实就是政府寻求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推动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虽然在早期,国家权力推进了乡村的政治现代化开端,但在外力强制解除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乡村传统文化的迅速复苏又说明了农村自主力量与国家外在强制力量冲突的一面。这种冲突在今天农村文化礼堂中表现为墙上的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求神拜佛的蒲团同时出现。因此有学者认为,乡村秩序和公共空间的重建,关键在于国家与民间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sup>[8]</sup> 其实早期的中国城市空间建设已经提供了一些经验,包括当城市功能和社会阶层被清晰区隔、城市空间成为一种均质空间时,城市人际交往活力明显降低。虽然混合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结果,但这种不可预知也隐含着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可能性。当我们回到当下,看到杭州农村文化礼堂中以多面向和多用途杂糅的空间使用,会感慨乡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意识,以及在国家恰当的外部力量推动下两种力量的微妙博弈和平衡。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 20 世纪 30 年代研究中国乡村时发现,“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各集团对这些权力象征的角逐从而给权威赋予一个共同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利益不同,甚至冲突的情况下,各集团亦能达成这种‘共识’”。<sup>[11] (18)</sup> 费孝通则认为,“在中国的政治整合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过程,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sup>[45]</sup> 考虑到乡村自治制度从 1982 年就开始推行,今天推动乡村现代化再以强制方式落地已不现实。两位学者以不同年代观察得出的相近结论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即我们仍需要启发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但并不一定全然回到乡贤或地方精英主导的模式。赵月枝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主义农民动员后建立起政权,在如何与社会相关联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或“文化治理”方面表现尤为突出。<sup>[46]</sup> 因此乡村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国家外部政策性的辅助支持和规范——这一考虑是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治理减弱后出现的诸多混乱现象——以多元公共空间为推动方式,实现中国乡村与城市的现代化同步,可能更为切实。最后,如以创新扩散理论著称的罗杰斯所言,“农民现代化的关键是他们从不同渠道接受新思想,到城里旅行、接触变迁中介人以及晶体管收音机一类的大众传播工具”。<sup>[47]</sup> 给予农民和农村以充分自主的选择来行使他们的权利,以及如何站在农民的主体性立场,回到他们的生活逻辑和情感世界展开研究,都是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熊芳芳,赵平喜.公共空间人际传播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分析[J].新闻界,2009(3):58-59.
- [2]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88-92.
- [3] 陈虹,刘雨菡.“互联网+”时代的城市空间影响及规划变革[J].规划师,2016(4):5-10.
- [4]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3):13.
- [5] 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J].社会科学,2009(2):53.
- [6] Anderson, K., Domosh, M., Pile, S. & Thrift, N. (2002).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UK: Sage.
- [7]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9.
- [8] 邱梦华.从国家与民间力量的关系看中国农村的秩序整合[J].台州学院学报.2003(1):78-82.
- [9] 浙江省农业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农业志(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312.
- [10] [美] 费正清,戈德曼.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M].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404.



- [11] [美] 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5-10.
- [12] 陈仁涛, 陈仙君.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5 (6): 145.
- [13]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 尼加拉: 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M]. 赵丙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4] 中共五洞闸人民公社委员会. 五洞闸人民公社史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9: 33.
- [15] 陈阿凤. 请到我家做客 [N]. 杭州日报, 1959-12-20 (93).
- [16] 王来青.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兴衰与变迁 [J]. 党史文汇, 2009 (2): 23.
- [17] 张乐天. 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334.
- [18] 向东兵. 破旧立新 移风易俗——在伟大的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里 [N]. 杭州日报, 1970-2-7 (4).
- [19] 本报讯. 热烈庆祝毛主席视察东方红公社十五周年 [N]. 杭州日报, 1974-8-23 (2).
- [20] 徐国普.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 [J]. 江汉论坛, 2004 (7): 67-69.
- [21] Till, K. E. (2003). Places of memory. In Agnew, J., Mitchell, K. & Tuathail, G. Ó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Malden, MA: Blackwell, 289-301.
- [22] 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65.
- [23] 张月华. 勤俭节约办好集体经 [N]. 杭州日报, 1981-2-15 (2).
- [24] 周少敏. 临安桐庐萧山部分社队办起影剧院 [N]. 杭州日报, 1981-8-8 (2).
- [25] 范平良. 农村文娱乐场所要清除易燃物 [N]. 杭州日报, 1983-1-17 (3).
- [26] 柯士成, 盛祥华舍家办影院 [N]. 杭州日报, 1988-7-27 (3).
- [27] 刘怀玉, 鲁宝. 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批评、运用与可能的生产——从日常生活哲学家到后现代都市思想家 [J]. 理论探讨, 2018 (1): 73.
- [28] 江建红. 淳安春节期间农村礼堂不空闲 鼓乐不断 歌声连天 [N]. 杭州日报, 1992-2-7 (2).
- [29] 富专办. “拆拆还改”四管齐下 富阳制止非法建造寺观教堂 滥建坟墓专项治理全面铺开 [N]. 杭州日报, 1996-3-14 (1).
- [30]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 [31] 关琮严. 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 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4): 67-68.
- [32]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M]. 吴松江、张文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92.
- [33] 陈竹、叶珉.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探索全面的公共空间理念 [J]. 城市规划, 2009 (6): 62.
- [34] 毛丹. 村庄的大转型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10): 2-13.
- [35] 周正楠. 建筑的媒介特征——基于传播学的建筑思考 [J]. 华中建筑, 2001 (1): 31.
- [36] 凌力. 透明的村务墙 [N]. 杭州日报, 1998-3-9 (2).
- [37] 郑大勇. “海选”村官 [N]. 杭州日报, 1999-6-18 (1).
- [38] 孙信茹, 杨星星. 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 [J]. 现代传播, 2012 (3): 23-28.
- [39] 王毅. 千岛湖新农村之旅片断 推独轮车、摸溪中鱼、吃农家菜、游原生态风景…… [N]. 杭州日报, 2006-7-14 (21).
- [40] 刘芳萍. 桃花源风情小镇打造新模式 村企合作 共建新农村 [N]. 杭州日报, 2010-11-11 (A11).
- [41] 陈久志. 30 多场演出, 让村民看出了瘾 “乡风文化千里行”杭州市文艺宣传巡回演出活动剪影 [N]. 杭州日报, 2007-1-30 (15).
- [42] 王蓓蓓. 文化礼堂添色 “人文光辉” [N]. 今日临安·新农村周刊, 2012-7-25 (1).
- [43] 丁雄英. 富阳窠口乡村大舞台开场 [N]. 杭州日报, 2011-12-15 (A02).
- [44] 管光前, 陈卫国. 临安横街村葡萄架下开唱 “后宫戏”再现钱王爱妃戴氏娘娘还乡盛景 [N]. 杭州日报, 2012-7-20 (A07).
- [45] 费孝通. 江村经济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06.
- [46] 赵月枝. “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 [EB/OL], <https://www.zgxcfx.com/sannonglunjian/100751.html>
- [47] 沙垚.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 [J]. 现代传播, 2014 (12): 56.